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讲,文学是个体心灵的表达,是情感的抒发、理性的思考与与世界进行互动的方式,所以,文学在其发生之初,是任何个体都可以产生的精神活动,成为相对专业的、职业性的行为是后来的事。即或文学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特征越来越明显,作为审美性的精神活动,它一直具有普泛性的特点。与其他行业不同,文学从业者的边界一直是模糊的,也一直是开放的。因此,文学史总是由两部分组成,专业的和业余的、精英的和民间的……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包括文学艺术。所以,不管文学的专业化程度如何,民间的或大众的文学一直是顽强的存在。

这样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全新的呈现,这集中表现在对文艺的人民性要求上。文艺的人民性已经是革命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属性,这一属性既体现在对专业的、职业的文学导向中,也体现在对大众文学的提倡中。这些提倡一方面 是引导民众的精神追求,以提高民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激发民众的文化创造,鼓励民众的文艺创作。从延安时期文艺方向的确定、大众化文艺的兴盛、通讯员的培养、“边区一日”征文……到今天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明确,培育和造就“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要求的提出,直到当下对“新大众文艺”的发现与鼓励,其面向人民大众的文学逻辑一脉相承。

『使他们的文学保持着坚强的主体性』

汪 政

二

青海固文学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突出而典型的表现。从新大众文艺的角度去观察,青海固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它鲜明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和现在我们常常提及的新大众文艺普遍呈现出来的个体性、分散性不同,青海固文学具有清晰的团体性特征,有着突出的地方主体性,是大型的地方性写作。青海固文学中常见的是青海固的山川风物、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尤其是当下的乡村振兴……对乡土与地方的如此专注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显得尤其重要。越是文化同质化的时代越是要坚持文化的差异,只有文化的差异才能给文化的生长提供活力,才是文化的最佳生态方式。青海固的地方性写作是坚实的,是本土的,它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不是奇异景观的炫耀,而是由写作者书写的历史记忆和创造的当代经验。所以,它在地方经验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方文化精神的提升上具有亲和性。要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认识青海固文学的意义。知识如何生产?现在的格局并非自告天然,也并非是唯一。知识生产一直存在着由下而上的模式,民众的实践和经验,乡绅、民间知识分子的总结、记载和提升,始终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渠道。虽然当今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地方,放弃民众知识生产的权利与责任。这就涉及写作者也即地方知识生产者的问题。从地方与以地方为写作对象的写作者的关系或写作方式看可分为他者的书写与“自者”的书写,青海固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自者”的书写,它拥有众多在乡写作者,他们就在青海固,为青海固立传,体现出高度的地方知识生产者的文化自觉。这是青海固的文化生产力,为地方精神的培育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青海固文学群落中,确实有人因为文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这种改变大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青海固的写作者们一边在青海固劳动、工作和生活,一边进行文学写作。他们的写作状态是“在生活中写作”。劳动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写作也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可以说他们一手扶犁一手握笔。和职业写作者不同的一点在于他们始终是普通劳动者,新大众文艺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主体是大众,是创作者的大众的身份主体性。对于青海固人来说,文学不是身份,也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他们人自身的精神需求与公共生活。当社会的文明高度发达后,许多社会职业会消失,文艺必将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与生活融为一体。这种文艺的未来性,因为青海固文学人的“在生活中写作”而提前成为现实。

地方的主体性和身份的 主体性必然带来写作内容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青海固文学的内容主体就是青海固。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都说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对青海固文学群落来说,他们的现实就很丰满,他们的诗就在近处,无论是外的生活、个人的内心还是深厚的地方文化精神。青海固的今天就足以让他们不停地歌唱,青海固人的昨天极贫极苦,因为引入黄河水,移民以及产业升级,他们摆脱贫穷,过上了好日子,这种沧桑巨变成为青海固人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贫瘠山水的变迁成为青海固文学的重要标识,青海固的写作者们,写的就是青海固人不断变化中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文学内外是一致的,生活是这样,写进文学也是这样。职业和专业写作者的写作是“代言”式的写作,讲的是别人的故事。而青海固文学写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是“自言”式的文学,青海固作家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这种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的现象不但值得研究,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发展启示。

青海固文学有这一文学群落话语的主体性。许多写作者都是从手机或QQ空间开始写作的。媒介、技术与网络给青海固人的文学表达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他们可以在工余的碎片时间里写作。一开始由于字节输入的限制,每次只能写上一两百字。青海固的许多写作者都经历过这种文体阶段,马慧娟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样的文字结集。文学是个大的场域,既有它的通用性,更有它的个别性。在文学专业化后,这种专业化会成为惯性与权力,它对行业中人具有规约性甚至强制性,对行业以外写作者也具有塑造力与同化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写作的内容上,如写什么更流行,也体现在形式和话语方式上,如怎么写更能加入时尚的风气。但青海固人的性格使他们的文学保持着坚强的主体性,这使得青海固文学不但写的是青海固的故事,而且在文学话语上也体现出独立性与主体性,不管是文体还是语言都是如此。例如马慧娟,她的长篇儿童小说《飞起来的村庄》读来有很强的散文性,在题材处理上也与同类题材小说不一样。她善于做减法,使写作内容维持在青海固儿童的认知维度里。她的报告文学《走出黑眼湾》也不是一般报告文学的写法,作品反映她家乡的脱贫攻坚,与这几年此类题材的宏大叙述相比,她的作品是个体日常琐细生活的散文化写作,她用人物与家庭去结构故事,用当事人的口吻去讲述,整部作品呈现出“生活流”的风格,散发着日常的气息与泥土的芬芳。可以说,有话语定力是青海固文学的重要特征。

三

青海固文学的这些主体性体现了新大众文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千万不能小看他们的这种文化参与,更不能对他们的小看有丝毫的傲慢与偏见。古代文艺史表明,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来自民间的创造,专业的、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文艺史的形成那还是中古以后的事。自中古时期所谓的文人自觉与艺术自觉之后,文艺史也一直存在着“钟摆效应”,许多艺术样式一开始都来源于民间,后来再被文人艺术家改造,由此走向专业,走向宫廷,在此过程中不断精细化、极致化,而这过一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丧失活力的过程。于是,文人艺术家又再次走向民间以及其他非艺术领域以寻找灵感、突破与新鲜样式,如同钟摆,循环往复。不仅是一些文艺样式,时代的文艺风气也都因为民间文化的引入和影响而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不仅存在于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它同样是文艺发展史上的定律。

何况,现在的传统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关系与过去的精英文艺和民间文艺的关系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与文艺素养大幅度提高,现在新大众文艺创作的起点、自觉的程度以及自身的升级换代能力都是过去的民间文艺不可同日而语的,它已经不是文艺的上游性初级产品,更不是对主流文艺的模仿,而是另开赛道,在艺术主张、艺术门类、艺术语言等诸多方面全面构建适合时代发展、科技进步、消费需求与时尚趣味的独立的艺术体系,这种与传统文艺具有竞争态势,特别是在市场上表现优异的艺术力量,不但是新时代文艺的新景观,同时也给传统文艺以启发。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竞争中的融合才是新时代文艺的康庄大道。

从大处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有助于从本质上优化文艺生态。我们固然要关注目前仍居主要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的传统文艺的创新问题,更新其观念,引领其方向,推动其内部多样性的生成,激活其内在的创造活力,同时也要扩大视野,引入外部的创新型力量,从而在更广泛的多样性上构建起更大规模的文艺生态。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无疑为这种理想的文艺生态建设提供了可能,处理好它们之间平等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必然会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促进它们的发展,激发它们不断地深度开发,形成和而不同、千舟竞发的文艺创新局面。所以,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破除各文艺力量、文艺类型间的阻隔和壁垒,让它们相互之间进得去、出得来,既有各自的个性与生存环境,同时相互间又具有平等友好的关系,这才是文艺应有的良好格局。可以说,目前的青海固文学还没有被传统的、专业的文学“收编”,它是自满自足的,它与它脚下的土地构成了互动的良性循环,与广大的文学世界处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统一中。它也在借鉴主流的文学话语,但是,这样的借鉴不但没有取代自身,相反,它还在向主流文学提供着新鲜的元素,这种意义是文学的,更是文化的、社会的。这种良性的互动为如何构建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必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学实践的重要经验。

“吃了五谷想六谷”,青海固一位女作者用当地的俗语如此形容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理想追求。世上本来只有五谷,虚构出来的“六谷”是人的理想、精神的代称,于这位女作者而言,它同时就是文学。这句俗话也可以用来描述青海固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中的地位,它是文学,但却是别样的文学,是传统的、专业的文学“五谷”之外的另一种文学谷物,是不可重复的“青海固文学”。文学要发展,就应该有更多的各具个性的青海固文学,并且保护它们,维护它们,像维护基因一样的维护这些新大众文艺的独特存在。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青海固文学：黄土地上的生命诗学

王琳琳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西北黄土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青海固文学。20世纪后期,宁夏文学创作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其中青海固作家群体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自1998年“青海固文学”概念正式提出以来,该地区作家作品屡获国家级文学奖。在新时代语境下,青海固文学凭借其深厚的文化传承,独特的文学创作风貌,在当代文坛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文化标识与时代精神特质的文学现象,谱写了黄土地上文学青海固的生命诗篇。

文化土壤滋养了青海固的文学创作群体

在当代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图景中,青海固文学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脱颖而出。这里不仅完整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延续了深厚的社会风俗传统,为青海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源。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遗存,到作为古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边陲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从现存六个朝代的长城遗址,到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等历代帝王在此留下的历史足迹;再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吉将台堡实现的历史性会师,这一系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滋养了栖居于此的青海固人民。2011年,西吉县荣获了首个“文学之乡”的称号即是明证,文学在黄土地上蓬勃生长,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区域样本。

青海固地区培育出了一批在文学创作领域具有专业造诣和突出成就的人才。这些创作者通过勤奋求学跨越城乡鸿沟,进入都市后,其文学创作自然流露出超脱功利的心态,真挚地表达了对国家的深厚情感。该地区涌现了以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为代表的鲁迅文学奖得主,以及杨梓、单永珍、王怀凌、马占祥、杨建虎、林混等致力于诗歌精神探索的群体。还有于秀兰、古原、王漫曦、火会亮、赵炳庭、了一容、张少强等作家,他们在坚守文学传统的同时勇于创新,充分体现了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郭文斌散文集《中国之中》《中国之美》运用独特的话语修辞策略构建认知框架,以乡村生活为叙事载体,深入阐释生命哲学命题,充分展现了其对中华传统美学价值的深刻把握与独到见解。石舒清小说集《底片》《九案》以及长篇小说《地动》,巧妙选取青海固地区的日常物件为引,运用截取历史片段的简笔勾勒方式,创作新时代反映地域文化历史演变的文学作品。

文学就是青海固人民的生活。新时代的青海固文学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在艰辛的劳作之余将文学作为其重要的生活方式。青海固文学创作群体逐渐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今天的青海固文学,农民作家成为时代的领跑者,上到耄耋之年的老者,下到初出茅庐的青年,他们都在极尽笔力地书写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国家的感恩和民族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作家马骏、单小花、曹兵、马文菊、彦妮、王秀玲、凡姝等创作者在文坛崭露头角。其中,“90后”西吉作家马骏凭借其散文集《青白石阶》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该作品以“青”和“白”为人生之喻,展现了作者对文学救赎力量的感悟,以瘦弱之躯深情表达在这片土地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感恩之情。

在当代社会发展显著加速之时,青海固的时间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呈现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科技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文化繁荣的背景下,这里涌现出一批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学爱好者与创作者,他们秉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反观青海固生态变化,反观宁夏的地域文化,怀揣浓郁的家国情怀,为青海固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青海固文学传统,也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移民地域构建了青海固代际相传的文学思维

青海固以“五方杂错、风俗不纯、人地和谐、融合更新”的地域特征而著称。从地理学视角考察,1953年设立的青海固回族自治区(由西吉、海原、固原三地组成)虽建制较晚,但其核心区域如原州、海城等地自古就是中原文明与边塞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固原”一名源自“古原州”与“固原州”的音转,寓“固若金汤之古原”之意,历史上被誉为“八郡之肩背,三镇之要膺”,除军事屯田功能外,更承载着多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记忆。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宁夏青海固、甘肃定西及河西地区)以来,这片长期与“生态脆弱”“生存艰难”“贫困落后”等文学描述相关联的土地,成为脱贫攻坚战略的关键区域,在此背景下孕育出独特的青海固文学思维。

迁徙与融合磨砺了青海固创作者的文学意志。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固地区经历了支宁移民、吊庄移民、易地搬迁移民、扬黄扶贫移民、生态移民等多种迁移模式,这种特殊的迁徙历程,使得这里的人们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延续了中国传统“传帮带”的技艺传授模式。他们依托书院、期刊等传统传播载体,创新性地构建起代际传承与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学发展格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青海固。

青海固地区独特的文学创作范式为当代大众文艺的创

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彰显了新时代大众文艺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的传承与发展。以郭文斌、杨梓、火会亮、马金莲等为代表的青海固籍作家,他们均担任过或正在从事编辑工作。创作之余,他们传承并发扬了宁夏文学“传帮带”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发掘创作新秀,悉心培育文学新人的工作。著名作家张贤亮在回顾其创作历程时,特别感念《朔方》编辑杨仁山等人的慧眼识珠,正是这份伯乐之谊成就了其文学事业,也推动了宁夏文学的蓬勃发展。宁夏文联及作协通过文学讲习所、青年创作班、高级研修班等多种形式培养新生力量,孵化优秀作品,从而形成了宁夏各地区文学创作薪火相传的鲜明特色。宁夏的《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等文学期刊始终践行发掘新人、专业指导、培育本土文学资源的使命,肩负起鲁迅先生所提出“过付的经手人”的责任。

作为宁夏文学的创作高地,青海固作家群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根基,将文化交融与文明传承升华为独具黄土高原特色的文学表达体系,深刻诠释了对生命价值与人文精神的艺术追寻。这一文学现象可从三个代际相传的作家创作实践中得到印证。如老生代作家火仲舫,致力于青海固红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其《红军在西吉》《将台堡会师前的往事》等作品系统记录了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的历史细节,生动呈现了青海固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乡土风貌;中生代作家季栋梁《青海固笔记》这一具有民族志特征的长篇报告文学,采用实地考察与回访的创作方式,深刻反映了青海固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新生代的马金莲、马慧娟、许艺等女性作家,则从文化深处思考乡村振兴背景下女性命运的变迁。青海固的作家和描写青海固的作家们用现代性视野审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于坚守中创新,并通过文学形象进行艺术诠释。

青海固文学传统并不是现成之物,而是由一代代青海固人共同参与构建的动态过程,在与书写青海固的其他地域的作家互动中,青海固文学不断发展与丰盈,尤其是在表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传承、包容、创新等鲜明特征,从而形成了具有新时代风格标识的文学思维方式。

乡土话语孕育了青海固文学的诗意表达

青海固文学作为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实践始终浸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当代文学创作探索实践中,青海固地区的人民在艰苦贫瘠的环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文字间深刻内化了黄河文化务实进取的精神特质。尤为可贵的是,即便在处理城镇化进程等现代性议题时,青海固作家仍在其话语中深蕴乡土诗意的独特韵味。

青海固文学所呈现的乡土特质并未停留于地域方言土语、社会风尚及民间传说的表层书写,而是融入诗意文学探索的创作实践。马占祥、安奇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诗人,于诗歌中追寻古典、探寻乡土中负载的传统文化,诗意地表达情感;凡姝、曹兵等农民诗人扎根乡土,立足于熟悉的乡土环境,在村庄与田野间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展现农民群体的集体命运。青海固作家把创作的“根”深植于挚爱的黄土,以直面苦难的勇气,用生命共鸣的诗歌点亮生活,他们因而更亲近包括人性在内的自然。了一容的生态文学作品以细腻笔触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共生状态,深刻展现了生命共同体的命运交织,对生命力的慨叹无暇修饰,沛然而出,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诗意。

青海固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深入剖析了乡土社会的建构过程,通过描绘山乡巨变中的物质文明演进、社会制度转型及农民心理嬗变等维度,深刻且全面地阐释“乡土中国”的文化内涵,并揭示其形成机制与变革动因。杨占武的《牧马清水河》应被视为一部思考宁夏地域乡土文化形成的散文集。作家全面展现了宁夏历史演变中物质文化(如河流、山川及水窖、窑洞等)、制度文化(如马政等)以及精神文化(如语言、宗教、道德、民俗、教育)等多层次的变革,并于其中探析宁夏历史演变中地域变迁及乡土性格的成因。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则是一部以文学之美诠释乡土社会变革内因的作品。小说描绘了青海固地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气象和乡村气象,世代乡民所秉持的质朴品性、善良本质与生活智慧在乡村经济社会变革中呈现的深层伦理、道德之变,全面展现了青海固充满诗意的地方风情和风俗特色。

总之,青海固文学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学现象,在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独特又多元的创作格局与艺术创新路径。质朴而热爱文学的青海固人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不断丰富本土文化底蕴,探索“感恩”“认同”“生命”“使命”“乡土”等文学创作主题。青海固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宁夏地域文学所蕴含的独特诗性特质,为跨媒介艺术改编提供了优质的文学素材,电视剧《山海情》艺术化地再现了青海固生态移民工程的社会图景与地域美学特征;刘苗苗执导的影片《六谷儿》则深刻诠释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群体对文化精神的诗意追求。青海固文学不仅照亮了宁夏大地,其影响力更辐射全国。青海固的基层文学创作者们亦将继续用劳动者脚步,行走在六盘大地,按照生活的样子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表达他们最赤诚的生命感悟。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教授)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吴桥乡脱场村大麦田

新华网发